

「东方，在夹缝中生存」

东方代表着一种历史的温情主义

它试图调和两个世界，调和两种文化，调和两个时代

这种努力注定要全盘输掉

它离北方太近了，它离土地又太远了

每一个民族主义者都面临着痛苦的选择

叶曙明

革命中国

叶曙明

革命青年中国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草 莽 中 国

叶曙明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1 插页 290,000 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 7—5360—2237—9

I·1920 定价：15.30 元

目 录

第一部	南方，一部反叛的历史	
第一章	王朝的叛徒	2
第二章	坐失良机	28
第三章	南方的狂潮	58
第二部	北方，官僚的摇篮	
第四章	沉寂的帝都	98
第五章	还政于清	131
第六章	道德调和的失败	151
第三部	西北，抵抗着中原	
第七章	土皇帝们	182
第八章	农夫的政治	204
第九章	“军事北伐，政治南伐”	240
第四部	东部，历史的温情主义	
第十章	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	262
第十一章	国破山河在	309
第十二章	东方的崛起与没落	336
后 语	365

第一部

南方，一部反叛的历史

第一章 王朝的叛徒

太平天国唤醒了秘密帮会的政治意识，革命党之所以能够把人们团结在一个团体中，不是主义的成功，而是秘密帮会的成功。

如果人们有机会在中国作一次穿越南北，横贯东西的旅行，他们将会发现，在这四个方位之间，居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同。

以地理环境而言，东南方平畴千里，水赋山春，河流如网，湖泊如星。天气受东南方低纬度的太平洋气候影响，温暖潮湿，雨量充足，在沿海地区有大量的冲积土，土质肥沃，人口稠密。

而中国的西北方则受高纬度的北亚气候影响，即使在夏季，海洋性的夏季风也不易进入。因此，这里的西风气流非常强盛，空气干燥，冬天气温寒冷，春天则风沙弥漫。

东南方拥有漫长的海岸线，纵横交错的内河。这对发展贸易，十分有利。当欧美现代文明东渐之际，这里无疑会得风气之先。而西北方地处亚陆腹地，受层峦叠嶂之阻，交通不便，资讯贫乏，外部世界的影响，到达这里已经微乎其微。

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南北民俗和民风也各异。千百年的沉积，造成相互间的歧视和排斥，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北方虽然以王道正统自居，但面对五岭之隔，亦难免有

鞭长莫及的感觉。因此，南方一直是朝廷流放罪犯和失宠官员的地方，这些人把自身的反叛性带到了南方，很自然地，他们所信奉的“异端邪说”也就在南方传播和滋长开来了。

这种对北方和朝廷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终会酿成动乱，打破中国现存的文化架构和政治架构。

自从南方出了一个洪秀全以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接踵而起，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南北对抗，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中国人头一次听说天地间有一样东西叫“民主”。

在近代中国，南方是秘密帮会的乐园。太平天国运动，实际上是一次帮会势力的大检阅。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会”，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组织，不如说是一个帮会组织更为适当。当太平天国杀向北方时，活跃于东南方的所有秘密帮会——天地会、征义堂、青莲教、哥老会、金钱会、小刀会等，几乎都起来响应了。

太平天国唤醒了秘密帮会的政治意识，使人们觉得加入这类组织不再是可耻和骇人的事情，而是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献身。现在谁也不会说帮会是“盗贼”了，它们被称为“会党”，或者“革命团体”。

号称“政治革命运动”的 YOUNG CHINA PARTY 在中国崛起，乃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当时有人把它译作“少年中国党”，有人把它译作“兴中会”。两个名字的异同，无人考究。但从字面上看，前者有政党政治的色彩，后者则是模仿秘密帮会——也许这更符合创始者的初衷。因此，后来名垂青史的是后者。这虽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几乎无人在意，历史学家也没有觉察二者的区别，但中国的悲剧，由此可见端倪。

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革命党的出现，从一开始就赢得留学生的热烈支持，然后得到国内开明士绅和新军人的附和，在海外也广受爱国侨民的同情。但真正的推波助澜者，却是三山五

岳的黑社会大哥。

革命党在短期内发育成长，有赖于它所高揭的民族主义大旗。“驱除鞑虏”的主张，和康熙年间洪门聚义时“满覆明兴”的主张，一脉相承。大汉族的理想，曾激发起无数仁人志士彻底牺牲自我以救世的勇气。

在南方，反抗专制的革命党，把众多不同出身、不同阶层的人，上至名门望族、达人雅士，下至贩夫走卒、屠儿刽子，团结在一个团体之中。这种成功，不是主义的成功，而是秘密帮会的成功。

光绪三十一年（1905）。

日俄战争刚刚结束，在“火红的夕阳”照耀下，满洲原野依然硝烟弥漫，日本人还没有从纵情狂欢之中平静下来。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把自己的锦绣山河提供给外国人打仗，天朝尊严，扫地无遗。在亡国空气的笼罩下，反叛情绪，油然而生。离经叛道的言论，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尤为畅销。谈论革命，已经成了公开事情。

9月1日晚上。在日本东京神田三崎町，一间光线昏暗的小房子里，聚集着几位从中国南方来的留学生。他们是胡衍鸿夫妇和廖仲恺夫妇。夜沉如水，大家都在互相望着，沉默着，等待着。

当门外传来脚步声，房里的人几乎同时跳了起来，目光一齐射向门口。通向走廊的移门打开了，从外面走进两个男人。前面是胡衍鸿的堂弟胡毅生，后面那个人站在阴影里，打量着四周的环境。当他走到灯前时，胡衍鸿一眼认出了，他就是自己仰慕已久的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上前和他们用力握手。在异国的沉沉黑夜，在简陋的日本式房子里，这次会面对他们、对同盟会、对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历史，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孙中山盘腿坐在榻榻米上，用温和的目光注视着大家。他开始纵谈三民主义，详细解答胡衍鸿提出的疑问。他所宣讲的一切太奇特了，太新鲜了，和胡衍鸿在法政学校所学习的经济学截然不同。

“究竟怎样才能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地位平等呢？”胡衍鸿问。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孙中山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回答，“如果革命成功，还重蹈欧美日本的故辙，最大多数人仍然受痛苦，那决不是我们的目的。”

“好，”胡衍鸿兴奋地一拍大腿，“现在我什么疑问都没有了，从今以后，我就跟着先生干吧！”

欧美经验，在中国革命发端之始，就遭到强烈的否决。孙中山的谈吐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胡衍鸿知道自己的一生，都离不开这位40岁的香山人了——他们都是广东同乡，包括廖仲恺夫妇。

由于政治的腐败，要使一个青年走上反叛之路，并不困难。就在那天晚上，胡衍鸿和廖仲恺同时加入了同盟会，在盟书上郑重地画了押。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当时并不成熟。他对日本友人解释共和理想，“是我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可以追溯到三代之治，和近代世界的民主制度，扯不上什么关系。他承认他的理想是怀古的，不过他说：“其所以怀古，岂不正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证据吗？”在孙中山的心底里，也许更多地把自己视作天下寄其身的圣人，而不是某一党派的领导。他成立同盟会的目的，是希望把它变成全国帮会组织的大同盟，以“驱逐鞑虏”的旗帜，一统江湖，号令天下。

在讨论成立同盟会的会议上，有人对孙中山的理想表示怀疑，提出质问：“将来革命成功，你究竟是帝王还是民主？”孙中山没有回答，他带着慈祥的微笑望着提问的人。他常常以这种宽容的

微笑使怀疑他的人感到愧疚。大家都觉得十分尴尬。来自安徽省的程家桢急忙站起来打圆场：“现在只问满清要不要打倒，不问是帝王还是民主。”“对，我们应该相信孙先生。”有人附和。“如果不信孙先生，我们还能信谁？”大家都笑了起来，气氛变得轻松了。是的，谁可以怀疑孙中山的人格力量呢？他不必替自己辩解，他的举止、神情，甚至一闪而过的目光，都使他显得那么伟大和具有说服力。

在东京加盟的留学生就有好几百人。除甘肃没有留日学生外，17省的人都有。

如果以籍贯划分，广东的人数最多（170人），湖南居其二（158人）；陕西最少（4人）。可见王朝叛徒，多出于南方。

同盟会本部设在东京。孙中山（广东籍）担任总理，黄兴（湖南籍）担任庶务部总干事，马君武（广西籍）、陈天华（湖南籍）负责书记部，程家桢（安徽籍）、廖仲恺（广东籍）负责外务部，宋教仁（湖南籍）为司法部检事，汪精卫（广东籍）为评议部长。会中要职，几乎由南方人垄断。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帮会中都担任着要职。

青年们的理想是颇为模糊的，加上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势力大行其道，所以，尽管这批青年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已经把大清江山搅得满城风雨，但他们自身也隐伏着重重危机。

10月6日，保皇派在东京举行“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这是一年一度的例会。

胡衍鸿作为同盟会本部的代表出席。当他来到会场时，已经有一千多人聚集在此。这些人显然处于盲目的狂热之中，他们急于听到最激烈的言论，迫切需要一位雄辩家和鼓动家。保皇派在台上演讲，博得一片掌声。胡衍鸿感到全身热血沸腾。突然，他抛开众人，大步登上了讲坛。

一颗灿烂的明星升起来了。当一千多听众听到他滔滔不绝的雄辩时，全场气氛达到沸点。他以康、梁同乡的身份，痛斥保皇主张荒谬绝伦。

“康有为的思想，分为五级退化。”胡衍鸿措辞刻薄地说，“他从想做教主退为共和，从共和退为立宪，从立宪退为变法，最后从变法退为勤王保皇。真是江河日下，伊于胡底！”

一连三个小时的演讲，宛如大河奔流，一泻千里。不仅赢尽喝彩，而且使保皇派手忙脚乱，不知应对。出于愤懑和失望，他们仓促宣布，这样的大会，以后不在东京举行了。

当大会结束，人们四散而去的时候，胡衍鸿深深相信，他的演讲已经跟着这些人走了，而且永远不被遗忘。

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胡衍鸿又以一个大汉族主义的笔名“汉民”——大汉遗民——连续发表文章，公开宣称《民报》的宗旨就是要“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和实行土地国有”。人们开始惊异地打听，“汉民”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胡衍鸿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他出生在广东番禺一个县衙刑名师爷的旧式幕僚家庭里，从小熟读十三经、文选、史记、古文辞一类书籍，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儒家行为准则奉为圭臬。据说胡衍鸿的母亲一向教导他要向王安石学习，虽然贵为宰相，但一朝赋闲，也能恬然自适。大丈夫就是要提得起，放得下，这才不失读书人的本色。

和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胡衍鸿认为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了明主，所谓“良禽择木而栖”。现在胡衍鸿找到了孙中山。他成为同盟会最主要的理论家之一，“汉民”这个名字，可谓如日初升，而他的本名却反被人渐渐淡忘了。

这年的11月2日，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开始，留学生们并不以为意，到了当月的26日，收容中国学生的各校突然贴出告示，限中国学生于三天之内将原籍、现在地址、年龄、学籍和经历，一律具报，逾期将有不利。

在日本留学的并不止中国学生，为什么别人不用登记，光要中国学生登记？这岂不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奇耻大辱？

可以肯定，日本人决想不到这一决定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应。12月5日，几百名留学生冒着严寒，聚集一堂，他们的情绪悲哀而狂怒。当有人试图提议和平解决这一事件时，立即遭到大家的唾骂。

肄业于实践女校的秋瑾——自号“鉴湖女侠”，在横滨三点会担任“白纸扇”（军师）的职务，三点会是三合会在日本名称——痛哭演说，大骂中国人做事虎头蛇尾，声言以后绝不与留学生共事，然后夺门而出。

有人冲出门去，对着秋瑾的背影大声发问：“我们该做些什么？”

没有回答。声音被怒吼的北风卷走了。

这次风潮，由于同盟会中坚分子陈天华的投海自杀，推向了顶点。留学生迅速分化成两派。一派以宋教仁、秋瑾等湖南、江浙人为首，号召大家退学回国，从事革命；另一派以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古应芬这些广东人为首，认为所谓“取缔规则”可以交涉解决，如果现在一哄而散，无疑会造成根本动摇。

两派学生都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大打笔墨官司，互相斥骂。敌对情绪，形同水火。在一次学生俱乐部的聚会上，有人突然站出来叫喊：“把胡汉民和汪精卫这两个软骨头处死！”竟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们把这两个家伙叫来，”秋瑾激动得满脸通红，“以各省分

部部长的名义把他们叫来。如果他们反对我们回国革命，就请他们切腹！”

有人把秋瑾的话告诉了胡汉民，并劝他不要冒险。胡汉民低着头，脸色苍白，当他抬起头时，一种忧郁庄重的阴影笼罩着他的脸庞。“不，”他冷静地说：“我去。”

“我是不去的。”汪精卫说，“这些人完全不可理喻，有什么好谈的？”

“如果我们不去，别人就会说我们不可理喻了。”胡汉民站在窗前，凝视着外面的风雪。狂风卷着一团团的雪在空中飞舞，仿佛要破窗而入。胡汉民打了个寒噤。他转过身说，“都是同盟会的同志，相信不会有什么解不开的死结。不管他们怎么对我，我还是得去。”

胡汉民独自前往。风卷着雪花纷纷扬扬，路旁店铺的暖帘缓缓扑动，人力车留下辙印很快就被雪淹没了。好一场大雪。

胡汉民一走进大门，立即被愤怒的学生包围了，各种口音的斥骂声震耳欲聋。胡汉民岿然不动，显出一种刚毅沉着的气度。

“诸位，”他开腔了，“本党的使命是要推翻满清，实行三民主义，这个责任是多么重大，路途是多么遥远，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大家就沉不住气，吵着要回国。如果大家一哄而散，我们在日本辛辛苦苦建立的一点革命基础，岂不毁于一旦？那孙先生回来了该会多么痛心？梁启超那班人不会笑掉了大牙？”

一番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箝口无言。

“听说你们判了我的死刑，”胡汉民淡淡一笑，目光扫过众人，“我只道满清政府要杀我，却没想到自己同志也要杀我。满清还没推翻，就先杀自己人了？好吧，反正我的话也说完了，谁要杀我，现在可以动手了。”

大家在他的目光下退却。一场莫名其妙的危机，虽然以莫名

其妙的方式暂时解除了，但如此内讧，反专制的革命，谈何容易。

同盟会在“取缔规则”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分歧，仅仅是一个征兆。这样的裂痕，势必会层出不穷，而且愈演愈烈。事实证明，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的一切，并不都可以牺牲。

翌年的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民报》周年纪念会。赴会者竟达万人。孙中山在会上宣讲革命方略，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五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其大旨可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听众们如醉如狂，欢呼声、鼓掌声如同暴风骤雨。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

然而，大会刚刚结束，同盟会为了革命军的旗帜式样，又是一番唇枪舌剑。孙中山坚持用青天白日旗，旗帜上一轮白日，周围是12道叉光。

孙中山解释说青色代表平等，白色代表博爱，12道叉光代表千支之数，非常有中国味道。

黄兴不满地说，青天白日旗太像日本的太阳旗了，他主张用井字旗。井字代表井田制，难道井田制不是同样很有中国味道吗？

这些革命家们在策划推翻帝制时，脑子里充满了对尧舜时代那些古老传说的憧憬。

“话虽如此，”孙中山眯起眼睛打量了一下井字旗的样式，“不过，这个图案太缺乏美感了。”

黄兴大发牢骚：“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须执著第一次起义之旗？”

“那么，克强（黄兴字）兄为什么一定要执著于井字旗呢？”孙中山笑着问。

其实，这场争吵完全不是什么美感问题。因为这面旗帜将作为一个永恒的标志，载入史册，所以采用谁的旗帜，似乎就等于承认谁是历史的创造者。

幻想固然幼稚，但从感情上来说，却是可以理解。几乎每个政治家，都沉浸在同样的梦想中。

当孙中山向皇权宣战时，他相信会有三千五百万帮会成员追随他的革命事业。

在“取缔规则”闹得最凶时，胡汉民曾嘲笑退学回国、从事革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农历新年刚过不久，他便和孙中山一起离开日本，前往南洋筹划革命军事去了。

形势发展之快，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象征，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策动下层造反这一艰巨工作上面。尽管他游历过世界很多地方，能说流利的英语，并在香港公理会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对西方政治和社会具有比其他中国人更深的认识，但他在从事革命工作时，却更热心于利用江湖游民中的秘密帮会。据他估计，全国的秘密帮会中，大概有 3500 万会员会追随他的革命事业。

事实上，孙中山本人也加入了势力最大的帮会组织——洪门，并成为其中一名地位颇高的首领。

这一类的帮会，都有自己的暗号、手语、法律。其成员品流复杂，地痞、流氓、散兵游勇、江湖艺人、农民、内河船工、小商人、手艺人、乞丐，几乎无所不包。尽管草创之始，他们有的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如洪门），有的是以安清报国为目的（如清帮），但到了后来，这两者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大部分基层组织均已沦为江湖盗贼。

江南的秘密帮会，以洪门、青（清）帮为主。

说起青帮，百多年来名震天下，无人不知，其势力足可以和江

湖第一大派洪门平分秋色。但青帮原称“安清帮”，顾名思义，是一个效命朝廷的民间组织，和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可谓南辕北辙。

据帮会中人自称，清代乾隆时，因河漕不靖，粮运不行，而有佛教宗派的陆祖以时势维艰，启奏朝廷，称不日“海晏河清”，自有贤能报国。以海晏的晏字去日为安，河清的清字作靖字解，意为“国泰民安，运河清靖”，暗示将来有“安清”为国运粮。朝廷准奏，陆祖便来到浙江杭州武林门外保朝山下哑叭桥的刘氏庵讲经论法，广收门徒弟子。

这天刚好有游客翁岩、钱坚相约前往听经，途遇潘清，相谈甚为投契，愿拜陆祖为师。以后随陆祖往五台山孝祖学道，叙以年齿，陆祖各赐道号，为翁德惠、钱德正、潘德林。当时朝廷为整顿漕运，悬榜招贤。陆祖便让三人进京揭榜，以尽职志。后来奏准朝廷，各开山门，广收门徒弟子，分配到各船帮服务。所以青帮奉陆祖为始祖，翁钱潘为祖师，立下“三堂六部二十四辈”。三堂即“翁佑堂”、“钱保堂”、“潘安堂”；六部分掌引见、传道、掌簿、用印、司礼、监察各事；二十四辈即将青帮门徒弟子分为“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悟学”二十四个辈份。

青帮弟子讲的是江湖义气，如果初到一处，必须客气一番，和主人说：“兄弟腿子短，少来亲候，两眼墨黑，条子不熟，请老大灯笼高挂，海涵海涵。”当年茶馆、酒店、旅馆的老板，差不多全是在帮的。所以帮会弟子到茶馆去，可以先和茶房打个招呼：“喂，伙计，泡碗茶来，坐子带来，扯个旗来。”如果出门困难，要求援助，把茶壶放在中间，茶碗放在左右边，自然有人会来帮你。

在酒店吃完饭如果没有钱付账，也不要紧，把右手沿嘴唇向左边一抹，再将右食指顺嘴唇右上角一撇，凑成一个“白”字（口加舌是一“日”字，加上右食指即为“白”字），意即白食，对方

便能会意，在帮之人最讲究直爽，自会替他付账。到了清末，朝廷气数已尽，民间秘密会党蜂起，青帮也渐成为专门从事黑门行业的帮会组织，跑腿（行窃）、灯花（夜劫）、露水（日抢）、挑眼（挖洞）、落台（上高）、拆白（行骗）、放赌博、卖膏药、开娼寮，无所不为。

洪门也即天地会，三合会和哥老会属其分支。三合会在海外称为洪顺堂，或义兴会，在日本也有称为三点会的；在美洲则称为致公堂。江浙一带，洪门又有终南会、双龙会、白布会、伏虎会、龙华会、平阳党等小团体。青帮势力不及洪门，但亦有两大分支。一为主帮，系浙东温台人；一为客帮，系皖北江北人，又称巢湖帮，凡江南皖南、浙西的流氓光棍，多属这一流派。

青帮以佛祖为系统相传，按照宗派，招收门徒弟子，故为纵的组织，长幼尊卑，等级森严，所谓“师徒如父子”；洪门则标榜侠义精神，所谓梁山的根本、桃园的义气、瓦岗的威风，故为横的组织，“兄不大弟不小”。

青、洪两帮从本质上来看，并无多少进步性和革命性。会中法规严厉而恐怖，是儒家名教和江湖道义的混合物，纲常伦理，一应俱全，违反者砍头割耳，决不宽贷。

孙中山他们在河内设立秘密机关。孙中山化名高达生，胡汉民化名陈同，以饮食业为掩护，招纳亡命志士。

这是胡汉民第一次来南洋，也是他第一次从事实际的武装革命。他发现在民间活动的所谓革命党人；竟大部分为江湖道上的绿林好汉、贩夫走卒。孙中山在策动他们起义时，金钱的力量远远大于主义的力量。

孙中山用来收买会党的钱，主要来源是靠西贡的银行买办曾锡周和巴黎富商张静江的鼎力支持。

张静江是浙江吴兴南浔镇人，他的家族为南浔四大巨富之一，他在上海设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和大纶绸缎局，在巴黎、纽约